

应用性翻译活动之整体模型建构

钱纪芳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所, 杭州 310018)

摘要:以《中国译学大辞典》收录的交际收敛性模型为研究素材,以中国译学的螺旋式思维为导向,运用基于模型之上的研究途径,将翻译的控制型传播模型发展为应用性翻译活动之整体模型。该整体模型包含五W宏观结构中作者方、译者方和读者方之间的和合互动关系,原作和译作的和合再生关系,以及五W微观结构中的译者在译码、解码和编码过程中的和合互动关系,译者的协商性文化解码立场,“真、善、美”之文本功能调适编码准则。

关键词:应用性翻译活动;整体模型;五W控制型结构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王宁先生^[1]将当今语境描绘为全球化时代,其表现特征之一是海量的信息流通性。基于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光导纤维通讯设备,人类进入一个实现实时、快速和交互传送文字、声音及图像的数字时代。既往的文化成果,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领域的智慧实现大汇合。在这样以几何级数般增长的信息量中,实际需求集中在金融、商业、科技、文化传播等应用性领域^[2],原先翻译的主要对象——文学只占20%左右。翻译实践的主舞台由精英让位于海量的大众译者,风险是大众译者缺乏应有的译学素养,或扭曲信息,或成为经济强权的附庸。而当下翻译研究的局面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多元系统,其缺点是多元模型缺乏主干。没有本体理论的制约与统领,过于强调翻译活动的某一方面而破坏其基本原则,甚至消解翻译活动本身^[3]。再加上应用性翻译活动本身的宏大覆盖面,着实使大众译者处于迷惘状态。因此,建构应用性翻译活动的可操作性主干译学模型,为大众译者提供译学线路图,以培育与跨国资本性相对抗的全球化人文精神已成为当下译学研究者的迫切任务之一。本文以《中国译

学大辞典》收录的交际收敛性模型为研究素材(以下简称《大辞典》),运用和合翻译思想^[4]之整体模型研究途径^[5],尝试建构应用性翻译活动之整体(主干)模型。

1 应用性翻译活动的基本概念

依据贾文波^[6]在《应用翻译功能论》中描述的基本概念,得到以下信息:1) 定义,应用性翻译活动指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型翻译;2) 内容,包括人们日常接触和实际应用的各类文字,涉及对外宣传、社会生活、生产领域、经营活动等方方面面。其范围几乎涵盖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囊括除文学翻译以外的所有作品。

从“定义”分析可得:应用性翻译活动的核心是“传递信息”;再结合“内容”分析可知:“传递信息”的目的是为了交际,即传播文化、扩大影响、塑造形象等。与应用性翻译活动交叉的其他学科主要有信息学、传播学和社会语言学。后三者的关系是传播为本体、信息为内容、社会为使用环境。这样,我们就找到应用性翻译活动理论的收敛点,即“信息”或“交际”。以此为线索,我们在《大辞典》的现代译论中找

收稿日期: 2013-05-29

基金项目: 浙江省语言文字科研项目(ZY2011C62);浙江省英语专业重点建设课程

作者简介: 钱纪芳(1964-),女,浙江诸暨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E-mail: qianlaoshi04@126.com

到指导应用性翻译活动的三个现有译学多元模型,即功能目的论、交际学派和释意派^[3]。因释意派主要针对口译,在此暂不讨论。目前所缺的是前两个模型的有机和合体,即应用性翻译活动之整体模型。

2 两个现有译学模型简评

2.1 功能目的论

“功能”主要指文本或翻译的功能,源自 20 世纪 70 年代于德国产生的功能主义。它从传统的等值理论发展而来,只不过后者的等值点在于与原作等值,而前者在于文本的交际功能^[3]。从原作到交际功能的焦点转移实质意味着等值理论从客观到主观的转向。当该功能派后发展至翻译目的论时,主观性明显占了上风。其核心理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3]。

笔者认为其贡献是:1) 注意到了翻译活动中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翻译纲要”这一概念反映了委托人对译者的制约,因为该纲要包括译文的预期功能、译文接受者、译文接受时间及地点、文本传播媒介、译文目的或出版译文的动机等^[3]; 2) 赖斯(Reiss)提出文本功能对等理论,其三大功能,即“信息型”、“表达型”和“诱导型”几乎成了当下应用性翻译的“圣经”,如图 1 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概括阐释^[7]所示。该理论的缺陷正如诺德(Nord)所归纳的十条批评^[3]意见中的第 5 条所说的那样——目的论并非基于经验结论。众所周知,翻译首先是一门经验科学。超越经验而依从目的,意味着背离科学的客观主义,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倾向。因此,目的论蕴含不尊重原文、导致产生唯利是图的翻译家及译者等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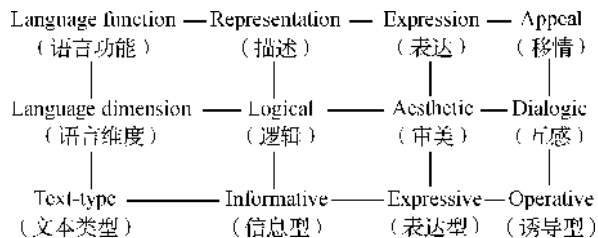


图 1 文本功能对等理论

2.2 交际学派

交际理论或称信息论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介入翻译领域。其核心理念是: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信息理论中的基本原则。“翻译乃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8],翻译的焦点在于

传递语境中的信息。该学派的国内主要研究者是吕俊和侯向群。他们认为翻译活动的本质是交往传播^[9],并采用传播学创始人之一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所创建的控制型传播模型来阐释翻译活动,如图 2 所示。后来,社会语言学介入该派,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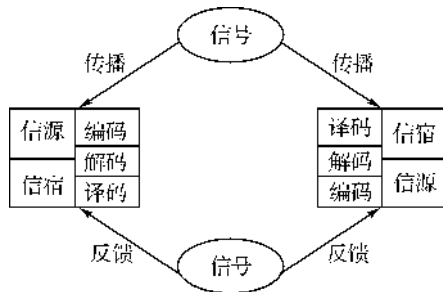


图 2 翻译的控制型传播模型

笔者认为其贡献是提供了在通信的传输和处理系统语境内处理信息的方法,使得信息(信号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分析更具科学性。其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3]。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两个模型的收敛点在于:1) 交际行为,交际学派克服功能目的论主观性和单向性的缺陷,无论在理论视野和严谨性方面都显得更优越些; 2) 功能,虽然两派的着眼点有所不同,但在实际使用中,文本类型功能确实使用率更高些。

3 全面审视交际学派的翻译控制型传播模型

3.1 追溯翻译控制型传播模型之源

翻译的控制型传播模型^[9]取自施拉姆的控制型传播模型^[10](如图 3),但绘图箭头的向度有误。笔者认为它是从拉斯韦尔的五 W 结构传播模型^[10](如图 4),和贝尔的翻译过程模型^[11](如图 5),发展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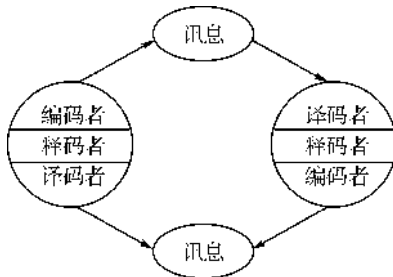


图 3 施拉姆的控制型传播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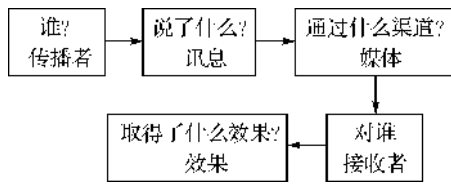


图4 拉斯韦尔的五W结构传播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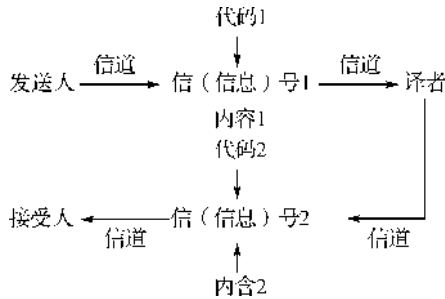


图5 贝尔的翻译过程模型

经典性的五W结构模型是传播学的奠基人和先驱者、美国政治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lod D. Lasswell)所提出的。它规定了传播学的五大研究领域,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者分析和效果分析,为传播学搭建了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理论构架。五要素之间是一个既相互关联又繁衍变化的动态性有机整体。但五W模型的缺陷是将传播视作一个劝服过程,内含传播者对受众施加影响的企图。因此,该模型在总体上形成了一个线性的、有向的发展过程,使得这个模型缺少应有的反馈交互环节,导致交流双方无法评估传播的实际效果,容易造成话语权的不平衡问题。同时,还忽略交互传播中社会环境(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因素和交际双方动因影响的主观因素。

罗杰·贝尔将语言看成一个可以表示意义的形式代码结构,同时也是一个用代码形式来指示实体的交际系统。他从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角度来解释翻译的交际过程。贝尔的翻译过程模型实际上相当于两个首尾相连的五W传播模型,其中译者既是前一个五W传播模型的接受人,同时又是后一个五W传播模型的发送者,而五W传播模型的缺陷依然存在。

施拉姆为了克服单向线性模型的缺陷,增加对传播活动中反馈和双向的描述,提出一个动态、开放的控制型传播模式。他认为要使传播取得成功,传播者和接受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共同经验,才能共同分享信息。这就涉及到双方的社会环境系统问题。传播者的文化系统与接受者的文化系统各自带着自己集团的社会文化系统烙印。基于这样的理解,他

以人际传播的相互作用、双向传播以及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依存关系(在传递信息时,传播者是主动的,接受者是被动的;在反馈中,传播者是被动的,接受者是主动的)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在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具双重角色的交互式模型。其中,“编码”就是将意义用符号的形式表述出来;“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意义,并重建意义;译码就是受传者对符号的理解和阐释过程。

3.2 修正翻译控制型传播模型之图式

带有反馈机制的交往与传播模型使整个过程具有互动性,交际双方在过程中可以调节自身,从而使传播系统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的可控制状态。吕俊认为翻译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与此基本相仿,只是翻译跨越了文化,在编码与解码的内涵上有了变化。在这个传播学的控制论模型中,各种要素联接成整体。无论哪一个要素受到强调,都必须调动其他要素协同运动才能达到目的。于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综合性和实用性的模型^[9]。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翻译与直接传播毕竟只是“相仿”,因为翻译明显多了一个环节。为了更清晰地演示翻译的传播控制型模型,笔者采用贝尔的思维方式将之描述成图6。从图6可以清晰地看出翻译相当于两个循环圈,两圈之间的核心链接处是译者。其次,施拉姆模型的人际传播取向比较明显,其中的双向是以“对等循环”为基础的,忽略传播者文化与受众文化之间在意义空间里的话语权力较量关系,因而只是一个理想化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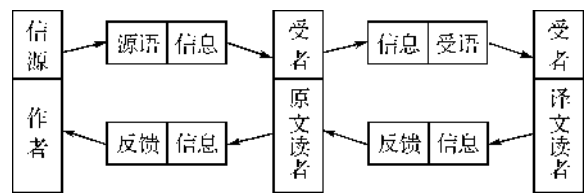


图6 修正后的翻译控制型传播模型

3.3 补充翻译控制型传播模型的可操作性

首先,为了弥补翻译的双循环控制型模型的文化意义缺陷,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英国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解码模型^[12],如图7所示。霍尔将社会学中的帕金模型(Parkin model)引入传播学领域,用来解释不同阶级的成员如何解码媒介信息。他的研究直面一个以往理论批评家们所忽视的重要事实: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行使,除了压制性因素外,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被支配阶级和集团的“自由赞同”来实现的。通过对传播接受者的

背景系统(知识结构、生产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分析,揭示意识形态“编码”与大众“解码”策略的相互作用。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因为编码者与解码者各有一个“意义结构”,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同一性”。他根据帕金按阶级将人的“意义结构”分成的三种形态(支配、从属和激进)假设了三种解码立场:1) 主导—霸权立场,表明受众的意识形态运行在占支配地位的符码之中,是一种优势解读;2) 协商立场,受众基本采用编制好的意义,但对有些信息会根据具体的当时当下的情境或自身的立场、兴趣进行修正。该立场既认同主导—霸权所“给”的意义,同时又在情境中保留自己的权力,使信息中内含的意义适合于“局部条件(自身的特定利益)”;3) 对抗立场,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故意置之不理,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颠覆编码者的传播意图。霍尔模型的积极意义是让人们注意到解读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社会谈判过程和意义空间里的话语权力斗争。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其本身的意识形态会对所从事的翻译活动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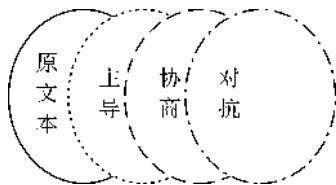


图7 文化意义的解码模型

其次,吕俊等是从建构主义视角探索翻译学时提到翻译的控制型模型,它是作为翻译的一般模型出现的,并未专对应用性翻译活动,也未涉及具体的翻译实践。笔者认为应用性翻译活动的整体模型与翻译的一般模型相比,有其本身的特征。一般模型指向权威性原文本(如文学文本),作者的思想与创作艺术是其价值所在,因此,通常以作者为中心。而应用性翻译文本的作者大多具有匿名性,甚至常常在概念与分类的清晰度、叙述结构及其逻辑严密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从此意义上说,功能目的论以读者为中心,运用文本功能对等的方法来解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将文本功能对等理念融入到模型的编码环节中。

4 应用性翻译活动之整体模型建构

应用性翻译活动之整体模型建构,如图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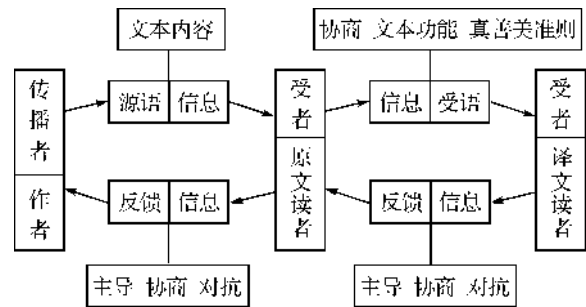


图8 和合型整体模型

4.1 5W 宏观结构之表征

4.1.1 5W 宏观结构链之表征。“谁”即作者方(融合出版商或某一有利集团之意图),其次是译者方(融合委托人等之意图);“说了什么”就是原文本和译文本所传递的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主要是出版/印刷文字或网络公开发表文字;“对谁说”主要是受众(其中译者是原文的受众之一);“取得了什么效果”主要看作者方的意图是否顺应当时的社会认知诉求以及译者对作者思想与彼时彼地的社会认知诉求之间的平衡艺术。

4.1.2 作者方、译者方和读者方的和合互动之表征。翻译即交际,但成功的交际取决于和合。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人际关系的和合互动过程如下:(1)作者在写作前,与文学创作需要体验生活,并从生活中获取灵感与素材的经历一样,他们需要对社会认知诉求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当作者感知到某一事件时,在征得授权写作的资助方的支持下(大多情况甚至是利益集团直接授予作者某个意图),着手开展调查研究,并在充分分析所得数据的基础上,确认目标大众的兴趣取向及心理满足需求,然后写作用文本,并通过控制媒体渠道来操纵或诱导大众的感知;(2)当作品引起良好的反响后,语际翻译的赞助人(可能是同一个利益集团,也可能是另一个利益集团,如目的语的出版商等)会产生翻译传播意向。该赞助人根据语际之间的文化差异程度委托译者(大多是通过委托翻译公司寻找译者)或复现原文本的信息(信息发送者处于主导型文化语境)或再次根据彼时彼地的社会认知诉求二度创作原文本所传递的内容(信息发送者处于协商型文化语境),其中的译者既代表原文读者的需求,同时也为鼓吹者服务;(3)译者的角色从本质上说是无意图的,除了满足作为原文读者的需求这一基本目标之外,其作用就是作为中介为目的语受众传递信息,一般不存在其他带有私利性的传播目的。当译者接受翻译任务时,如果能同时接收到委托人的翻译纲要,就要凭借自

身的专业知识对纲要做认同或磋商处理。否则,译者就需要跟委托人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以便妥然确定具体的翻译策略。

4.1.3 原作和译作的和合再生之表征。(1)原文本的再生性,应用性翻译活动的原文本并不具备很高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通常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连续体。其变动性取决于利益集团(鼓吹者)与大众的互相理解及共识合成,同时,也取决于通过信息流动方式所获得的不中断反馈信息及对反馈信息的重视。当原文本被翻译成外文时,原文本得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再生。(2)译文本的再生性,大多数应用性文本以当下的信息交流为目的,生命力短暂。但其中也不乏恒常信息,如外宣文本所含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等信息。后一类译文本完成后,随着委托人对目标社会认知诉求度的认识加深,也根据不断的读者反馈,会微调原文本视角或更新具体数据的条件下不断地做重译或延伸至其他语言翻译的活动,有时,甚至在不甚满意译文质量的情况下做复译。而不同的译者具有不同的翻译风格,即使是同一个原文本,译文本的行文也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

4.2 5W 微观结构之表征

4.2.1 5W 微观结构链之表征。译码,即译者以受众之一的身份读取原文本的思想;解码,即译者以受众之一的身份重建原文本的文化意义;编码,即译者以从属性传播者的身份转换原文本的意义,并生成译文本。

4.2.2 译者在译码、解码和编码过程中的和合互动之表征。(1)译者在读取原文本思想时,同时需要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写作规范、文本功能、原文受众的反应等信息。(2)考虑到成功交际的前提,译者最好采用协商性立场重建原文本的文化意义,总体上保持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平衡性。(3)基于应用性原文本在写作质量上的差异性现实,译者可以采纳赖斯的目的语文本功能调适策略,即在忠实于原文思想的前提下,根据原文本的功能,按目的语规范调整原文所传递的信息,以保证译文语篇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4.2.3 译者的协商性文化解码立场。即使在主导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出时,译者通常会以传递作者思想为中心,但鉴于语际文化的差异性,有违读者文化的思想等值还是不值得追求的,如一个民族所看重的某些写作内容移植到另一个民族会让后者产生抵触情绪或感觉不知所云,其结果会对传播效果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译者需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力,

将原文中隐含的信息适度地明示出来,以降低译文的难度。反之,译者更需要为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协调双语间的文化意义的平衡转换。甚至在文化强弱势差异很大时,译者可以将重心适当偏向译文读者的文化期待,以增强译文的传播效果。

4.2.4 “真、善、美”之文本功能调适编码准则。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在大多数给定的应用性翻译语篇中,赖斯的三大功能类型通常是一体的,互不可分。只有在词语或短语层面上才能实现较充分的分离。因此,译者需要有机整合这三类功能。整合的操作性准则为“真”、“善”、“美”。“真”针对“信息型”功能,即真诚地向读者告知真实世界的客观事物和现象。在遇到原文中的真理性错误时,译者有纠错的责任;在遇到原文信息模糊时,译者有查实该信息的必要,并将之清晰地表述出来。同时,将情况报告给委托人以取得认同。“善”针对“表达型”功能,即善意地传递原文的审美情趣。审美常涉及文化意象的不可译性,译者需要以信息之“真”为支撑点进行二度创作,不能独立于信息之外。“美”针对“诱导型”功能,即比较完美地传递原文本预期的超语言效果。此外,语际间的文本体裁存在差异性,语篇的段落组合和行文风格亦大相径庭,译者同样需要本着“真、善、美”之宗旨,调适“语域(register)”、“风格(genre)”、“体式(tenor)”等参数,以平衡原文本体裁与译文本体裁的表述力。

5 结 语

应用性翻译活动之整体译学模型以集合当今众多学者智慧的《大辞典》收录的交际收敛性模型为研究素材,以中国译学的螺旋式思维为导向,运用基于模型之上的研究途径建构出来的。该整体模型在审视、修正、补充翻译控制型传播模型的基础上,融入文本功能对等理念,大大增强了其蕴含的5W宏观与微观结构的阐释力度。它既是应对全球化现象的产物,亦是为大众译者从事应用性翻译活动提供的译学线路图。

参考文献:

- [1] 王宁.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8.
- [2] 叶子南. 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143.
- [3] 方梦之.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19-29.

- [4] 钱纪芳. 和合翻译思想初探[J]. 上海翻译, 2010(3): 11-15.
- [5] 钱纪芳. 和合翻译思想之整体模型研究途径[J]. 上海翻译, 2013(2): 6-11.
- [6] 贾文波. 应用翻译功能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1.
- [7] Snell-Hornby M.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30.
- [8] Wilss W.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13.
- [9] 吕俊, 侯向群. 翻译学: 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30, 35, 35-36.
- [10] 丹尼斯·麦奎尔, 斯文·温德尔. 大众传播模式论[M]. 祝建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9, 13.
- [11] Bell 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31.
- [12] Hall S. Encoding,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G]. Hall S, Hobson D, Lowe P. Culture, Media, Language[M]. London: Hutchinson, 1980.

An Integrative Model Construction for Pragmatic Translation Activities

QIAN Ji-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Cybernetic communication model of translation is developed into an integrative model for pragmatic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rough integrative modeling approach based on communication-convergent translation models from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d spiral thinking wa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integrative model represents harmonizing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author, translator and readers, harmonizing regen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rce texts and target texts in 5W macrostructure and harmonizing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n translators' coding, decoding and encoding processes, translators' negotiative cultural decoding policy, encoding principles of truth, beauty and human goodness for text functions' adjustment in 5W microstructure.

Key words: pragmatic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tegrative model; 5W cybernetic structure

(责任编辑: 张祖尧)